

「選擇性交流」 —論中共海軍外交與對美競爭

Selective Engagements—Chinese Naval Diplomacy and U.S.
—China Competition

作者：魏斯諾(Joel Wuthnow)、包曼(Margaret Baughman)

譯者：陳駿穎 中校

本篇取材自美國《海軍戰院評論(Naval War College Review)》2023年Vol. 76，本文屬公開出版品。

提 要：

- 一、中共海軍現代化之「質」與「量」，從2000年至今已成為「不容忽視」之存在，其為爭奪海上與世界霸主地位之意圖，已令美國及周邊國家提高警戒。隨著美、「中」戰略競爭加劇，共軍正調整其對外戰略，並加強與包括俄羅斯在內的非美國盟友國家的海軍關係；美國亦試圖阻止中共建立新的海外軍事設施；而當前兩強也利用演習等方式來重塑區域秩序。
- 二、本文以美國「國防大學」資料庫為依據，用文獻梳理中共海軍進行軍事外交的選擇策略，再以量化方式實證其假設，研究方式有別於其他主觀性論述，值得海軍幹部參考。
- 三、分析中共「軍事外交」模式顯示，海軍正藉與他國海軍進行互動、建立夥伴關係，俾利北京能夠形塑其維護安全之和平形象。面對共軍對我國敵對態勢日漸升高之際，期望本文能深化國人對中共當前「軍事外交」之理解，讓國軍在「以敵為師」前提下，能夠「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關鍵詞：中共海軍、選擇性交流、美、「中」競爭

壹、前言

中共海軍最早源於成為一支沿海防禦力量，如今已成為能夠在整個亞洲沿岸，以及遠方地區投射力量的「藍水海軍」；

其軍事外交的重點是與外國合作夥伴進行「高層交流」(Senior-Level Exchanges)、「艦艇訪問」(Port Visits)和「軍演」(Bilateral Exercises)等外交活動。海軍負有保護「遠洋」地區利益的使命，

註1：Joel Wuthnow and Margaret Baughman, "Selective Engagements- Chinese Naval Diplomacy and U.S.-China Competition",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76, 2023, p.20。

並具備可遠海長期部署軍力的能力，更成為共軍中最積極參與軍事外交的軍種。這些活動在戰略和作戰層面上都具有重要意義，戰略上有助於塑造安全環境，並與關鍵合作「夥伴」(Partnership)建立關係；而在作戰層面上，通過與外國海軍的互動獲得經驗，並進行情報蒐集。²

本文³旨在理解共軍外交的範圍和驅動因素，並藉由美國「國防大學」(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有關中共軍事外交的最新資料庫，及中共「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s)的數據，分析2000-2019這20年期間的關鍵模式，解構共軍在選擇合作夥伴的優先順序。⁴其中在2000-2017年間的高層交流、艦艇訪問和演習都有所增加，但2017年後這三類都出現下降，相信是因為「軍改」及在吉布地(Djibouti)設立基地(減少艦艇訪問的需求)所致；雖然這種下降趨勢在疫情期間仍繼續，但在未來幾年中，外交活動可能會反彈回升。觀察也發現海軍外交在每個海洋地區都存在，但其間仍有差異，如海軍高層偏好訪問歐洲，而共艦則多在中東和東南亞停靠，相信與亞丁灣進行的反海盜行動相關。

作者也透過「多變量迴歸分析」(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以下簡稱「多變量分析」)⁵發現，中共海軍偏好與其他主要國家進行接觸；而與美、俄和歐洲等國海軍建立夥伴關係具有多重目標，包含塑造與其他國家關係、向先進對手學習及蒐集情報等。共軍並未將與美國的盟友合作視為優先，可能其目標並非削弱這層關係；同樣地，共軍也不偏好與「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ship)或「全面戰略夥伴」(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保持持續的合作(指與「中」方在經濟利益日益增長的國家)；此外，在探討地理便利性時(指該國家與共軍港口的距離、及做為頻繁補給地點的位置)，亦發現僅對艦艇訪問起到作用；但對於另兩種合作起到的作用並不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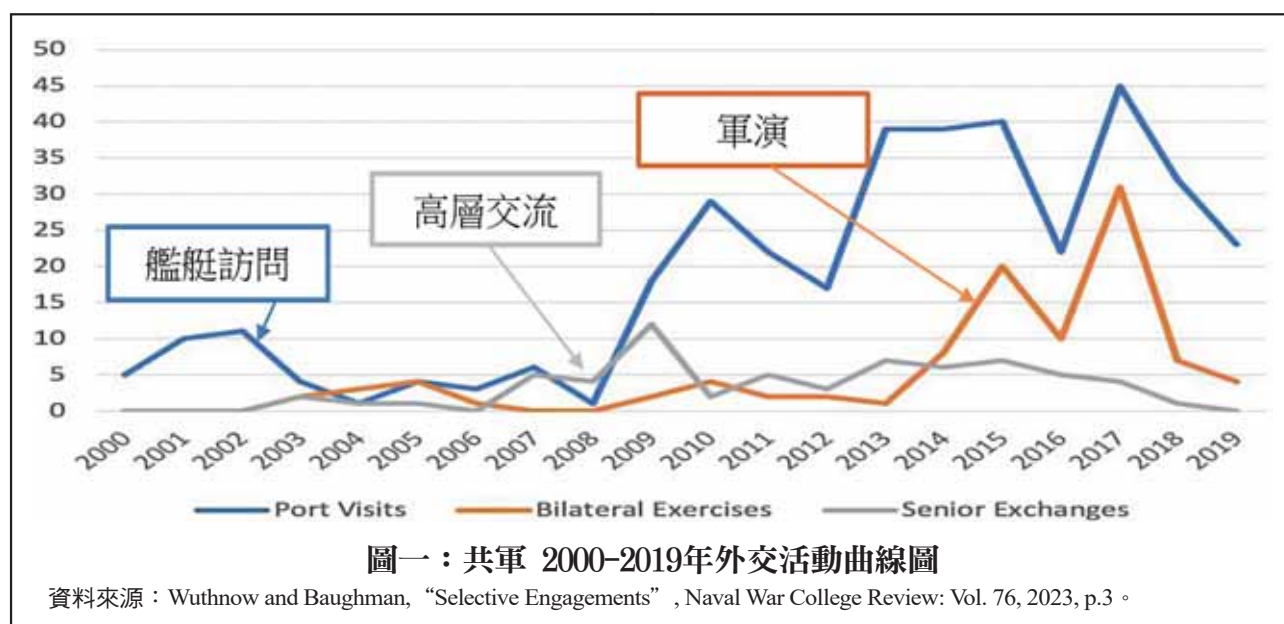
共軍也遵循一項「軍事外交」交流策略，確定如何、在哪裡部署有限的資源，以實現更大的利益。隨著與美國加劇的戰略競爭，吾人預期這一策略將會調整；而競爭的後果，包括與其他大國(如俄國)建立更加緊密的海軍關係；美國則試圖增加對中共在海外建立新的海軍設施的阻力；以及兩國各自利用演習和其他手段以塑造

註2：Kenneth Allen, Phillip C. Saunders, and John Chen,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2003-2016: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China Strategic Perspectives 11*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 Press, 2017)。

註3：譯者註：「Engagement」在軍事上多譯為「交戰」，然依本文內容譯為「交流」較為適切；另為方便說明，文內中共解放軍將以「共軍」統稱。

註4：同註1，頁20。

註5：譯者註：「多變量迴歸分析」是一種統計方法，用於研究多個變數之間的關係，它可以幫助理解和預測一個或多個因變量(被解釋變量)如何受到多個自變量(解釋變量)的影響。在包括社會科學、經濟學、醫學、市場研究等領域中都有應用；簡言之，當有多個因素同時影響一個結果時，研究因素間之變化關係。



地區新的秩序。

本文首先梳理2000-2019年間共軍外交的進展情形；其次，透過文獻分析找出共軍外交崛起和變化的主要觀點；第三，對這20年間三種類型的共軍外交做「多變量分析」，以凸顯最新的發展趨勢；最後做出總結，同時探討兩國戰略競爭對共軍未來可能的影響。

貳、2000-2019年共軍的外交活動

中共將軍事外交定義為包括高階領導互訪、軍售、雙邊和多邊演習、非傳統安全行動、情報蒐集和人員交流等一系列活動；⁶而海軍最常參與包括高層交流、艦艇訪問(多集中在休整和補給，其他包括

專業對話、海上閱兵或公開活動等)，以及與外國的雙邊和多邊軍演，如參加美國主辦的「環太平洋演習」(RIMPAC)等。⁷透過數據分析可以觀察到活動頻率的升降，及每個類型更明確的進行方式。

一、整體外交活動

(一) 概況

1. 共軍三類別的活動均在2008年開始增加，並持續10年左右(如圖一)；2004年也是一個重要的節點，當時領導人胡錦濤明確提出共軍的「新的歷史任務」，包括保護關鍵航道和保衛海外利益；⁸為應對新的任務，海軍需要能在更遠的地方進行作戰，並與外軍建立更強的關係。另一個重要時間點是2008年12月，中共啟動在亞

註6：譯者註：同註1。

註7：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invite the PLAN to the 2018 version of RIMPAC, because of U.S. complaints about Chinese polic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註8：See Daniel M. Hartnett, "The 'New Historic Missions': Reflections on Hu Jintao's Military Legacy," in Assess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the Hu Jintao Era, ed. Roy Kamphausen, David Lai, and Travis Tanner(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14), pp.31-80。



圖二：中共海軍「075型」兩棲攻擊艦(圖左)及「056型」輕型護衛艦(圖右)

資料來源：參考王柏文，〈陸再造第4艘兩棲攻擊艦準備犯臺？前海軍艦長一看嚇壞了〉，中時新聞網，2023年7月2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0702003602-260407?chdtv>；吳錫山，〈中共056A型護衛艦闖臺24浬鄰接區成功級艦廣播驅離〉，Newtalk新聞，2023年3月24日，<https://tw.news.yahoo.com/news/解放軍056a型護衛艦闖臺24浬鄰接區-成功級艦廣播驅離-073522084.html>，檢索日期：2023年9月15日，由譯者彙整製圖。

丁灣打擊海盜的行動，這也促使艦艇訪問和演習次數的增加。

2. 在2017年共軍這三類型活動都下降，原因應是當年8月正式在吉布地建立首個海外保障基地。2009-2016年間，共軍在全球共進行66次靠泊訪問(平均每年約8.3次)，但2017年後卻只進行13次(年均4.3次)，即是因該地提供一個安全的地點補給、休整和維修，亦代表共軍不需如既往一般依賴他國港口。⁹沿印度洋到亞丁灣的訪問減少，也導致演習次數降低，畢竟護航任務編隊多在任務結束、返航途中才會進行演習；至於高層交流次數下降，可能與高階幹部關注始於2015年底的「軍改」有關。

(二)美、「中」競爭加劇

1. 因為競爭加劇，美、「中」兩國海

軍間的交流減少。川普(Donald John Trump)總統時期，國家安全戰略強調對「中」大國競爭準備的必要性，導致多種層級的軍事交流減少。2017年後，雙方停止艦艇互訪，也不再針對〈海上衝突迴避規範〉(the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的作戰層面進行演習，高層官員(尤其是軍種司令)間的會議也變得不太重要。¹⁰基於交流可能會合理化共軍活動的擔憂，且已被隱含在對「中」政策內；而共軍在區域爭端中變得越來越具侵略性，也讓美國不希望提供共軍有任何向先進國家海軍學習經驗的機會。

2. 全球疫情(指COVID-19)也加劇下降趨勢，大多數涉及高階領導人的「面對面」會議被取消，與外國的演習機會也減少；儘管與俄羅斯和巴基斯坦等密切夥伴間

註9：Peter A. Dutton, Isaac B. Kardon, and Conor M. Kennedy, Djibouti: China's First Overseas Strategic Strongpoint, China Maritime Report 6 (Newport, RI: U.S. Naval War College, 2020), pp.36-37。

註10：Joel Wuthnow, "U.S.-China Military Relations in an Era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Univ. of Pennsylvania Project on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Philadelphia, PA, April 2021)。

表一：2000-2019年共軍軍事外交活動分布彙整表

地理分布	非洲	歐洲	中東	北美洲	南美洲	東北亞	東南亞	南亞	俄國	大洋洲	其他
高層交流	7%	21%	7%	14%	12%	9%	18%	5%	-	-	7%
艦艇訪問	13%	15%	25%	3%	7%		17%	10%		8%	2%
雙邊軍演	9%	18%	7%	7%	-	-	21%	19%	9%	6%	4%

資料來源：參考Wuthnow and Baughman, “Selective Engagement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76, 2023, PP.5-8，由譯者彙整製表。

仍進行一些小型演習，且護航任務仍在繼續(北京對外聲稱沒有水兵受到感染)。¹¹與疫情高峰期間相比，中共海軍的活動較少；空軍則積極提供他國個人防護裝備和其他醫療物資資源，藉此凸顯遠程運輸能力。¹²隨著「軍改」完成、疫情趨緩、新的遠洋型船艦(如圖二)陸續投入使用；威信部分活動將恢復，尤其涉及共軍在地區和全球影響力的競逐，都將因需要的擴大而增加。¹³

二、軍事交流模式

(一) 高層交流

1. 互訪減少原因係越來越多的會議選擇在中國大陸舉行。這20年間，有65次雙邊交流互訪，僅25次在國外舉辦，參加者多數是海軍司令員或政委。出訪和接待在不同時期也有顯著變化，前10年(到2010年)中，27次有16次在國外，但後10年，只有9次(國內則達29次)。原因包括習近

平進行的「反腐運動」(代表長時間的海外出訪不被鼓勵)，及軍方高層對「軍改」任務的專注。¹⁴

2. 海軍高層最常與歐洲、北美洲及亞洲(包括南亞、東南亞、東北亞、中亞和俄羅斯)的相對應層級會面，約占七成(如表一)，這與共軍高階幹部整體會晤情況一致(中共軍官最常與先進的西方和亞洲國家相對層級面會)；¹⁵另就互訪國家而言，共軍高層最常與美軍(7次)，其次是智利(5次)等國會面。彼此間也會透過視訊進行互動，如前海軍司令員吳勝利與前美海軍作戰部長格林特上將(Admiral Jonathan W. Greenert)就進行多次的會議與多邊對話。

(二) 軍演

1. 海軍是參與外軍演習最多的軍種，在2003-2018年間，參與的比例接近四成三(陸軍約四成二，其餘為空軍)。多數演

註11：譯者註：同註1，頁21。

註12：“Chinese PLA Sends Epidemic Prevention Supplies to Militaries of 20 Countries,” 中國軍事線上，2020年6月5日，<http://eng.mod.gov.cn/>，檢索日期：2023年9月15日。

註13：For an assessment of China’s expanding navy, see James E. Fannell [Capt., USN (Ret.)], “China’s Global Navy: Today’s Challenge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S. Nav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73, no. 4 (Autumn 2020), pp.13-43。

註14：Phillip C. Saunders and Jiunwei Shyy,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in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Perspectives and Recommendations*, ed. Scott D. McDonald and Michael C. Burgoyne (Honolulu, HI: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2019), p.213。

註15：Allen, Saunders, and Chen,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2003-2016*, p.49。

習(包含雙邊、多邊)著重於「非戰爭軍事行動(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如人道援助、災害救援及搜救；至於與親密的軍事夥伴如巴基斯坦和俄羅斯，也進行過以作戰為導向的演習。¹⁶這20年間，逾七成的海軍演習是雙邊的，但近年也頻繁出現多邊演習，而2018-2019年間，則有超過一半的海軍演習涉及多國共同參與。

2. 雖然共軍較少與西半球的夥伴國家進行演習，但與其他地區仍有顯著差異，最常的地點是東南亞，占比超過五分之一(雙邊和多邊)；與此相近的數量係在南亞和歐洲，此模式符合共艦到亞丁灣的航線，且部分護航編隊在任務後，會順道前往地中海與俄羅斯及歐洲海軍進行演習。¹⁷數據顯示，共軍偏好與緊密的區域夥伴和先進國家海軍合作，最常的演習夥伴就是巴基斯坦(17次)及俄羅斯(13次)。

(三) 艦艇訪問

這是一種海軍獨特的外交活動，區分為補給性和友好性，通常補給性訪問3-5日(不包括交流活動)；而友好性訪問則2-4日，包括與當地官員的會面、開放參觀及其他如體育競賽等交流活動。¹⁸研究發現，即使是補給性也可展示中共的承諾及海軍實力，同時發揮一定程度的外交交

流成效。地理的分布與演習合作夥伴類似，但中東地區泊港訪問比演習更常見(25:7)，這表示共艦常常訪問該地區(同表一)；訪問的首選包括阿曼與吉布地(各27次)，其他如巴基斯坦、斯里蘭卡、葉門、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均在12次以下。

參、中共「軍事外交」目標

地理位置也使共軍在「軍事外交」上面臨一個新挑戰，即如何將交流合作夥伴列為優先事項。透過文獻的檢視，中共軍事外交可分為戰略與作戰目標兩個層面，分述如後：

一、戰略目標

(一) 多個國家分析師認為，共軍的軍事外交支持北京更大的戰略議程。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認為，共軍醫療船在1990年代就曾訪問格瑞納達(Grenada)，是對該國轉向承認北京政權表示讚許的外交行為；中共「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以下稱「上海研究院」)的學者描述共軍在非洲的活動對減少反「中」情緒、幫助增進與中共的政經關係具一定效果。¹⁹由共軍資深學者撰寫的《戰略學》乙書，已被應用於專業軍事教育體系中，該書就主張海軍艦艇訪問及參加演習，應與重要的國家外交活動「緊密結合」，俾以行動支

註16：Saunders and Shyy,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p.215-216。

註17：Andrew S. Erickson and Christopher P. Carlson, "Sustained Support: The PLAN Evolves Its Expeditionary Logistics Strategy," Jane's Navy International, 9 March 2016。

註18：Allen, Saunders, and Chen,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2003-2016, pp.34-35。

註19：譯者註：同註1，頁21。

持國家外交。²⁰

(二)自2002年起，中共就定期發布《國防白皮書》。2019年版中，有關軍事交流的內容，就首先描述與俄國、美國的雙邊交流，這表明渠等是共軍優先考慮的關係；其他交流的討論則較少。²¹美國分析師指出，「中」、俄進行的作戰演練，包括海軍演習，有助向外界發出兩國防務合作密切的訊號，並塑造安全的環境。²²分析也認為，「中」、美的外交互動是北京穩定兩國關係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是一張可用的牌，可藉取消相關活動表達對美國政策的不滿。印度分析師則指出兩者間的對比，對俄國主要是建立一種「準軍事聯盟」(Quasi Alliance)，對美國則是「避免對抗」(Avoiding Confrontation)。²³

(三)在美國的文獻中，經常討論中共的「戰略夥伴關係」，這是北京對他國優先考慮的政、經關係所運用的一種「標籤」(Label)；且目前有超過100個國家有這個標籤，其中主要是「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²⁴分析指出，在

2003-2016年間，中共的「戰略夥伴」和軍事交流之間存在一定關聯；而美國國防部2021年的《中共軍力報告》則聲稱，「戰略夥伴關係」對共軍的外交活動具重大影響。²⁵

(四)軍事外交在培養與關鍵海洋夥伴的關係上尤為有益，研究顯示，與共軍互動會加強彼此正向關係，並做為中共與渠等國家關係狀況的「氣壓計」(Barometer)。²⁶「上海研究院」學者指出，中共在北非的軍事外交凸顯與該地區的「戰略夥伴關係」，其中包括「一帶一路」倡議的相關國家，也代表中共的軍事部署與「商業利益」之間存在聯繫。學者也將亞丁灣描述為「中共貿易最重要的航道和瓶頸之一」，這也解釋為何北京致力於與吉布地建立關係，並設立基地。²⁷

(五)日本學者則提出不同框架描述這些戰略目標，如「戰略布局」(Strategic Placement)指在關鍵地區確保共軍的進入權限，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及緬甸等國(均為進出印度洋的關鍵地點)；如「合作

註20：肖天亮主編，《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322。

註21：〈新時代的中國國防〉，新華社，2019年7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7/24/c_1124792450.htm，檢索日期：2023年9月15日。

註22：Allen, Saunders, and Chen,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2003-2016*, p.10。

註23：Prashant Kumar Singh,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Investigating PLA's Participation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trategic Analysis* 35, no. 5 (2011), pp.793-818。

註24：Georg Strüver,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lignment Based on Interests or Ideolog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0, no. 1 (Spring 2017), pp.31-65。

註25：U.S. Defense Dept.,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21), pp.14-15。

註26：Heath, *Winning Friends and Influencing People*, p.13。

註27：Hend Elmahly and Degang Sun,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towards Arab Countries in Africa's Peace and Security: The Case of Djibouti," *Contemporary Arab Affairs* 11, no. 4 (December 2018), pp.120-129。

」(Coopting)既涉及周邊國家，也包括法、英等國，並為中共的發展創造更有利的環境；而「制約」(Restraining)則是阻止其他國家(如印度、日本)與美國過於緊密聯繫關係。²⁸這些框架中隱含的相應策略，是中共試圖增強對美國介入其他重要國家的影響力，或削弱美國與盟友間的關係；如共軍與泰國、新加坡間的頻繁接觸就是潛在例子。

二、作戰目標

(一)研究強調，中共推動一系列「軍事外交」的目標中，都包含有情報蒐集。在高層訪問、演習和其他互動中，可以蒐集外國軍隊情報，並在支援中共武官網絡的工作上發揮作用。報告內容也指出，中共海軍的參與有助於獲取外國軍事戰略、科學技術和軍事現代化的最新訊息。所有交流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情報蒐集，研究也引用中共消息指出，海軍外交亦被視為共軍監視外國海軍和政府的一種方式。

(二)美國政治學者認為，中共在1993年的軍事戰略曾做出重大修訂，促使共軍與外軍進行多方接觸，以提升現代化水準和執行作戰的能力；這也有助解釋共軍自

1990年代開始的高層交流增加原因。如1998年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上將訪美，不僅觀摩美國空軍「紅旗演習」(RED FLAG Exercises)，也參觀「尼米茲級」(Nimitz-Class)航艦及先進戰機。²⁹學者也指出，共軍透過參加俄國舉行的高階演習，如「航空飛鏢」(Aviadarts)³⁰比賽和「和平使命」(Peace Mission)³¹系列活動，並獲取有用的戰鬥技能；而這種渴望獲得新技能的意願，有說明共軍與歐洲海軍進行的高層交流和演習比例相對較高的原因。

(三)共軍在亞洲以外的活動也有助於提升遠征能力，而獲取這樣的經驗，一直是中共在中東和非洲地區進行「聯合國」維和部署的目標，並讓共軍學習在外國領土上策定任務行動。³²亞丁灣的反海盜護航，同樣為年輕一代的中共軍官提供經驗，並讓共軍能在遠離家鄉的地方維持部隊運作，也為指揮官提供寶貴的領導經驗。共軍在亞丁灣的行動已超過10年，不僅任務效率提高，還協助共軍為應對其他遠洋任務做足準備(如保護海上交通線)；因此，反海盜護航確實有助提升遠征能力及增

註28：Matsuda Yasuhiro, "An Essay on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Examination of Intentions in Foreign Strategy," NIDS Security Reports, no. 7 (December 2006), pp.21-37。

註29：Tyler Jost and Austin Strange, "Delegated Diplomacy: Why China Uses the Military for Face-to-Face Exchanges", pp.26-27。

註30：譯者註：「航空飛鏢」係俄羅斯主辦的一項國際航空比賽。旨在展示參賽國的空軍和飛行員的技能和戰術能力。參賽項目包括航空射擊、空中機動、精確投放和技術表演。

註31：譯者註：「和平使命」是由「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簡稱SCO)成員國共同舉辦的多邊軍事演習活動，目的是加強成員國之間的軍事合作、增進互信和提高聯合作戰的能力。成員國包括中共、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家。

註32：Joel Wuthnow, "PLA Operational Lessons from UN Peacekeeping," in *The PLA beyond Borders: Chines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Regional and Global Context*, ed. Joel Wuthnow et al.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 Press, 2021), pp.235-61。

強保護海外利益的能力。

(四)部分學者評估認為，軍事外交目標同時在戰略和作戰層面上實現，與反海盜相關的雙邊和多邊演習及艦艇訪問，有益於中共外交政策、塑造國際安全環境、強化情報蒐集，並使共軍能學習新技能；且高階領導人會議亦能實現這些目標。³³分析發現中共高層常與先進的國家交流，這也與中共主要的軍火市場有關。³⁴儘管研究僅限於2010年之前的交流，但透過2021年美國國防部的研究發現，外交夥伴關係和武器市場都顯示2008-2018年間中共與非洲地區交流頻繁，³⁵對共軍的外交活動，提供更多且嚴謹的評估依據。

肆、實證分析

以下就中共海軍與其合作國家進行軍事交流(包括高層交流、艦艇訪問和軍演)內容進行分析，並分別追踪合作國家每年與共軍交流的次數，以「多變量分析」來估量「變數」(包含是否為盟友關係、彼此關係、海軍實力及地理便利性)³⁶的相對解釋能力³⁷(如表二)。有關變數分析與研究所見，說明如后：

一、變數分析

(一)盟友關係(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此項分為「北約」(NATO)盟友、非「北約」盟友、擁有雙邊國防條約的國家、美國本身及非盟友等五類。³⁸此變數可用來解釋，中共與該國交流是否意在削弱美國與其盟友的關係，如果該國為美國盟國卻有可能成為中共的外交夥伴，可以證實中共之意圖；反之，與非盟國接觸則意味著共軍優先考慮與那些尚未與美國建交的國家進行合作，無論此舉是為了影響不結盟國家，還是加強對「中」友好國家(如巴基斯坦或俄羅斯)的關係。

(二)彼此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s)

中共對彼此關係的識別，比是否為美國盟友更難。在過去20年中，其已大幅擴增夥伴關係的範疇，並使用大量的詞彙來賦予其戰略夥伴的「資格」或關係「升級」。資料庫中對這些關係並未做完整的說明；因此，研究透過蒐整中共外交部網站和駐外使館的每一份新聞稿，追踪夥伴國家關係「標籤」的變化。這種分類能掌握

註33：Saunders and Shyy, "China's Military Diplomacy," p. 211; Allen, Saunders, and Chen,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2003-2016, pp.11-12。

註34：譯者註：同註1，頁22。

註35：Jonah Victor, "China's Security Assistance in Global Competition," in Wuthnow et al., The PLA beyond Borders, pp.93-263。

註36：譯者註：在統計學中，「變數」(variables)指被觀察或測量的屬性或特徵；數值型的如年齡或身高；類別型的如性別或種族。解釋變數時，即試圖理解該變數如何影響其他變數或結果。這涉及到尋找變數之間的關係或相互作用，以瞭解其對研究結果的影響。透過統計分析解釋變數，可確定其對研究問題的重要性和作用。

註37：譯者註：統計模型中的解釋力指的是模型能夠解釋數據變化和關係的程度；若解釋力高，表示描述數據的模式與趨勢良好，將更容易理解數據間的關聯性。簡言之，解釋力像是模型的能力，可以幫助回答「為什麼」和「如何」的問題，並瞭解數據中隱含的訊息。

註38：同註35。

表二：中共海軍軍事交流變數概要表

變數	係指加入模型中用來解釋交流活動的因素
盟友關係(一)	「北約」盟友、非「北約」盟友、擁有雙邊國防條約的國家、美國本身及非盟友。
彼此關係(二)	夥伴、戰略夥伴、全面戰略夥伴及不明確。
海軍實力(三)	係指超過一百艘船艦的國家，並區分已發展及未發展。
地理便利性(四)	區分為補給便利性和距離遠近兩類。

資料來源：參考Wuthnow and Baughman, "Selective Engagement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76, 2023, pp.11-12, 譯者彙整製表。

彼此關係及事件發生時的關係狀態。截至2019年，北京已使用36個不同的「標籤」來區分與123個國家關係；要建立這不同級別の間隔變數來衡量關係的強度，中共需要明確的排名並假設每個級別間等距。³⁹研究也缺乏足夠的數據來綜整這些排名，遂將標籤分為夥伴、戰略夥伴、全面戰略夥伴及「不明確」(No Defined Relationship)四類，並假設渠等關係是為了加強在經濟或政治利益上優先考慮的國家，俾讓共軍更有可能與該國進行交流。

(三)海軍實力(Naval Powers)

交流對象是否為先進「海軍大國」也是變數之一；大國指的是有超過一百艘船艦的國家，儘管這只是不完全的分類，因為有些國家擁有小型但極具能力的海軍(如新加坡)，但卻可以避免以船隻類型對國家進行排名和評分的困擾。本文將「海軍實力」做一個「二元變數」(指已發展及未發展)，這可以略過頂尖國家間的排名問題。研究假設，共軍傾向於與發達的

海軍進行接觸，以學習經驗和蒐集情報，同時可以影響那些可能與美國結盟或不結盟的重要戰略國家關係。

(四)地理便利性(Geographic Convenience)

距離以北京到每個合作夥伴國家的首都的千公里(即1,000公里)為測量單位，再分為「距離遠近」和「補給便利性」兩類，同時假設所需的時間和財務資源較少，則中共更有可能與其建立夥伴關係。數據資料紀錄共軍的補給/維修模式，並對應共軍經常訪問或進行補給/維修的國家(多位於反海盜編隊前往亞丁灣的航線上)。研究也假設那些用做補給或維修的國家，應該會有更頻繁的艦艇訪問次數；但渠等與高層互訪較無關聯。

二、研究所見

本研究區分三組模型，模型一僅納入盟友關係變數，模型二則再增加地理便利性的控制變量，模型三將前述變數全部納入考量，⁴⁰分析結果(如表三)發現如后：

註39：Christopher Winship and Robert D. Mare, "Regression Models with Ordinal Variab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no. 4 (August 1984), pp. 512, doi.org/10.2307/2095465。

註40：譯者註：此處指「統計模型」，係一種用來理解和預測數據間關係的數學工具；可找出數據中的模式和趨勢，並藉數學公式表示之。將已知數據輸入模型，可預測未來情況或做出相關推斷。統計模型可應用於各種領域，如經濟學、醫學、社會科學等。

表三：中共海軍軍事交流類別與研究彙整表

軍事交流類別	研 究 所 見
高層交流	◎傾向與先進（海軍實力強）的國家進行高層交流。 ◎彼此關係更代表中共的經濟利益而非軍事利益。
艦艇訪問	◎利用艦艇訪問來獲取美軍的情報，也傾向與強國海軍進行艦艇訪問，顯示渠等國家對中共具有相似的影響力和情報蒐集目標。 ◎共軍利用艦艇訪問來支撐其現有戰略夥伴關係。
軍 演	◎偏好與主要的海上強國進行演習，尤其俄國。 ◎演習並非中共加強與現有夥伴關係的主要方式。

資料來源：參考Wuthnow and Baughman, "Selective Engagement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76, 2023, pp.14-17, 由譯者彙整製表。

（一）高層交流

1. 經模型驗證發現，中共傾向於與先進的國家進行高層級訪問，包括美國及「北約」盟友，由於北京並不偏好與美國的雙邊盟友或其他非「北約」盟友進行高層訪問，凸顯其並未試圖削弱這些國家與美國的關係。對中共而言，這些國家的整體戰略利益重要性較高，也希望透過軍事外交，塑造彼此關係；然而中共與非美國盟友的訪問頻率相關性更強，即使考慮地理便利性因素，研究結果依然不變。顯見共軍的領導人有較高意願與先進國家的海軍交流會面。⁴¹

2. 將「彼此關係」和「海軍實力」等變數加入模型後，其對於高層交流行為的解釋效果反而變差。在考慮所有變數關係的完整模型中，最相關且最具影響的變數是「非美國盟友」；此外，海軍的實力也與共軍高層交流互訪有顯著關係，不論對方是否是美國的盟友（包括俄國）。共軍高層多專注於少數重要國家，卻與具有複雜

外交「標籤」的國家互動較少；另外，中共的「全面戰略夥伴」很少涉及海軍大國，顯示此一夥伴關係與海軍實力之間的相關性較低，也進一步證實，彼此關係更多的是代表中共的經濟利益而非軍事利益。

（二）艦艇訪問

1. 增加更多變數可以提高模型的解釋能力，而「盟友關係」、「彼此關係」及「地理便利性」等三個變數對艦艇訪問最具影響力。⁴²研究顯示，共軍艦艇訪問並沒有很一致地優先考慮美國的盟友，無論是「北約」還是非「北約」盟友，且所有模型都沒有明顯影響；然而，在模型中顯示，雙邊盟友關係（指菲律賓、南韓和泰國）對共軍在印太地區影響美國的某些盟友方面較顯著（除日、澳外）。在模型中影響力最高的變數是「與美國沒有結盟的國家」，相較之下，共軍對與美軍的關係似乎更加重視。在2019年之前，美國平均每年接待共艦的靠泊次數為3.07次，高於任何盟友或非盟友的平均訪問率；且在三個

註41：同註1，頁13-14。

註42：譯者註：詳細統計數據，請參閱原文第13、15-16頁。

模型(同表三)都很顯著，代表共軍可能利用艦艇訪問來影響和獲取美軍的情報，也傾向於與強國海軍進行艦艇訪問，這顯示渠等國家對中共具有相似的影響力，並成為情報蒐集目標。

2. 模型數據證實，與中共有更高層次合作夥伴關係的國家在艦艇訪問頻率上確實較高。夥伴關係的強度每增加一個級別(指從合作夥伴、戰略合作夥伴到全面戰略合作夥伴)，訪問頻率亦增加；而全面戰略合作夥伴的國家，其每年的艦艇訪問頻率又比沒有夥伴關係的國家「高出一截」。此結果證實共軍利用艦艇訪問來支撐與現有戰略夥伴關係中的公開外交，並為未來的關係升級奠定基礎。至於「地理便利性」也是影響艦艇訪問的重要偏好因素，因為負有進行補給/維修等艦艇訪問的國家，頻率每年都有增加，距離較遠則訪問頻率下降。平均而言，訪問最少的國家是距離遠、也不在亞丁灣航線的國家，而這些合作夥伴往往位於拉丁美洲、東亞或非洲西岸等地區。

(三) 雙邊軍演

所有變數模型均顯示出中共對與美軍進行雙邊演習的偏好。研究顯示中共既有利用軍事互動來管理北京與華府間關係的意圖，並且渴望從全球領先的海軍國家獲得學習經驗並蒐集情報，不論這些國家與美國的盟友關係或與中共的距離遠近。出

於前述原因，共軍通常偏好與主要的海上強國進行演習，尤其是俄國。數據顯示，與非海上強國相比，中共與強國海軍進行年度演習頻率確實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演習次數與夥伴關係較高國家間並沒有顯著的關連，這說明相較於艦艇靠泊訪問，「演習」並非中共做為加強與現有夥伴關係的主要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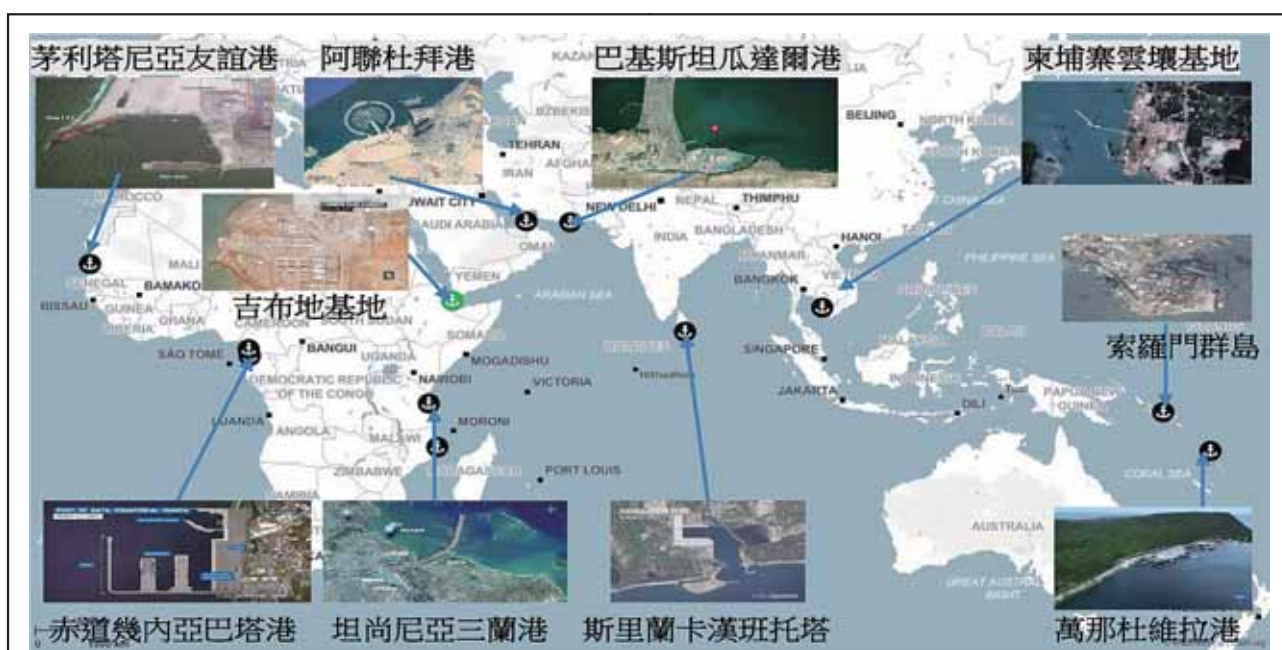
伍、結語

在2000-2019年之間進行外交事務一直是中共海軍的重要任務，儘管近年呈現出現下降趨勢(部分歸因於疫情)，但共軍仍在全球範圍內積極開展外交活動。歸納結論如後：

一、交流對象選擇

分析顯示，在不同的交流範疇中，共軍戰略與作戰目標都發揮一定作用，最一致與直接的解釋顯示，共軍傾向於與他國海軍進行互動；透過與美、俄或歐洲主要海軍建立關係，北京能夠塑造對國家利益最重要的選擇(無論是發展對美國的影響力或與俄國的緊密聯繫)，並從關鍵國家海軍中學習到作戰經驗，也蒐集到重要情報。與這些國家海軍進行合作，也隱含著另外的動機，就是展示中共做為一流海軍的地位，既激發民族自豪感，又有助於塑造安全環境；⁴³且在有限的資源下，北京需要在優先考慮的關係上做出明快選擇。

註43：Robert S. Ross,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2 (Fall 2009), pp.46-81。



圖三：共軍吉布地基地與可能建立之海外基地分布圖

資料來源：參考徐渝涵編譯〈報告指解放軍將在「亞洲和非洲」建海外軍事基地！有8處入列〉，聯合新聞網，2023年7月28日，<https://udn.com/news/story/6809/7330736>，檢索日期：2023年10月15日，由譯者彙整製圖。

事實證明，能滿足最廣泛且重要利益的國家，才是中共選擇交流的重點。

二、交流合作夥伴

(一) 夥伴類別

中共的合作夥伴「標籤」類別，對共軍行為方面的影響較小。儘管先前的研究和美國國防部每年的對「中」報告都暗示，「戰略合作夥伴」標籤影響海軍進行軍事外交的地點；但研究也發現，合作夥伴級別僅對艦艇訪問有作用，因為這是三種交流類別中最具公開導向的。艦船是最可見的存在象徵，共軍人員也會與外國民眾互動；故艦艇訪問成為北京在擁有日益增長的經濟利益面向上，做為提高聲譽的一

種可負擔方式。⁴⁴另外共軍在高層交流和聯合軍演方面，傾向與先進國家的海軍進行，俾能為共軍帶來不少的戰略利益和珍貴作戰經驗。

(二) 區域競爭

海軍外交並非中共企圖削弱美國及其盟友間關係的主要手段，中共慣於與未同美國結盟的國家進行交流；但在亞洲地區則偏好與部分美國盟友進行艦艇訪問。此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係地理上的便利性所致，也意味北京認為在區域影響力的競爭中，與同美國已建立協防承諾的國家進行軍事外交可能較有效。通過「經濟籠絡」(Economic Leverage)，較其他活動更有助

註44：Peter W. Mackenzie, "Red Crosses, Blue Water: Hospital Ships and China's Expanding Naval Presence" (Arlington, VA: CNA, 2011), pp.1-29。

於在華府與其重要夥伴國家間製造「分歧」(Wedges)。

三、未來影響

在美、「中」戰略競爭的氛圍下，未來幾年相信中共海軍外交將繼續地進行，而可能產生的影響，分述如下：

(一) 軍事的合作減少

雖然共軍仍願意與美軍交流，但由於雙方猜忌日深，軍事關係的下滑，預告合作機會減少。⁴⁵目前，雙方均限制部分海軍的交流；如2018年9月，面對美國的制裁，中共召回正在訪問的海軍司令員；又如自2018年起，美國不再邀請共軍參加「環太平洋」軍演。中共則因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於2022年8月訪問臺灣，而取消軍事交流，包括討論不安全的空中與海上互動的《軍事海事諮商協定》(Military Maritime Consultative Agreement)，讓雙邊軍事互動進一步惡化。⁴⁶隨著作戰層面交流減少，中共將更傾向於與俄國和歐洲國家進行聯合軍演；隨之而來，華盛頓可能要求「NATO」盟國完全避免與共軍進行接觸，或限制具關鍵敏感能力的各國與中共交往。

(二) 競爭升級

美、「中」海軍間在各自的夥伴方面的競爭，可能逐漸升級，雖然北京與「發展中國家」的「戰略夥伴」接觸主要限於艦艇訪問；但在與美國爭奪關鍵海洋國家影響力的需求下，可能會增加其他交流型式，而邀請外國海軍首長訪問，可能是一種不需要艦船進行長途航行的情況下，用以加強雙邊關係的方式；同時，共軍也可能加強與特定夥伴國家(如伊朗)的安全合作或軍售。⁴⁷美、「中」兩國間更具體的競爭也將集中在「進駐許可」(Access)⁴⁸的問題上，美國試圖限制中共在柬埔寨、阿聯酋、索羅門或坦桑尼亞等地建設新的海軍海外設施(如圖三)，因為這些基地將會擴大共軍的作戰範圍。換言之，雙方都可能考慮利用海軍來鞏固其在亞洲，及更遠的非盟友國家的影響力。

(三) 重塑區域安全

美、「中」都將利用海軍來重塑區域外交安全環境，美軍會更頻繁地與盟國和夥伴進行聯合演習，以彰顯其在印太和其他地區對盟友的承諾；如重啟的「馬拉巴爾系列」(MALABAR series)演習，涵蓋「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的所有成員國。⁴⁹因此，中共

註45：譯者註：同註1，頁23。

註46：〈針對裴洛西訪臺，中共外交部宣布反制措施〉，2022年8月5日，https://www.mfa.gov.cn/web/fyrbt_673021/jzshl_673025/202208/t20220805_10735734.shtml，檢索日期：2023年10月15日。

註47：Reuben F. Johnson, "The Dangers Presented by Russian and PRC Weapons Sales to Iran," Middle East Institute, 4 August 2020, www.mei.edu/，檢索日期：2023年9月15日。

註48：譯者註：access指地主國同意外國駐軍、暫停，或穿越其陸、海、空域的許可。

註49：譯者註：「馬拉巴爾」系列始於1992年，每年舉行一次，起初只有美國、印度參與，主要內容為海上救援、聯合反恐等，後來規模擴大，新加坡、澳洲、日本等都曾受邀參加，演習也向聯合作戰轉變。2015年日本、2020年澳洲陸續成

也有更大的動機，組織自己的軍事演習以強化海軍實力，並展示其在區域國家面前集結重要關係的能力。中共正透過「中、俄海軍演習」及「中」、俄、伊朗和南非等區域大國的擴大演習來實現前述目標。隨著時間推移，透過對更多新的數據和案例研究的分析，吾人將更瞭解共軍的外交行動，尤其是海軍的活動如何不斷地演變，俾更有效地應對與美國的競爭，後續發展值得關注。

陸、譯後語

當前中共海軍增長的軍事實力，已不單純是「量」的增加，且相較於2010年，共軍已有七成的艦艇完成「現代化」（包含預定研發的「057型」驅逐艦，如圖四），代表對我國的威脅將愈來愈大；故我國當「見微知著」，密切掌握共軍「現代化」趨勢，並預做準備。⁵⁰由於中共迄未放棄武力犯臺，且自去(2022)年裴洛西訪臺後，共軍不時以「圍臺軍演」進行封鎖演練，試圖影響我民心士氣；因此，瞭解其各項軍事外交作為，不僅是國軍應有之認知，且應是全民共識，唯有落實全民國防



圖四：中共海軍「057型」驅逐艦

資料來源：盧伯華，〈055之後中共超級戰艦來了：057驅逐艦「堆滿先進武器」〉，中時新聞網，2023年7月7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 enews/20230707000769-260407?chdtv>，檢索日期：2023年9月15日。

教育，方能凝聚抗敵意識、獲致勝利。⁵¹

藉由瞭解中共「軍事外交」模式，證明其積極與美、俄或歐洲等主要海軍建立夥伴關係、選擇對其利益最重要的國家進行交流之策略、從關鍵海軍力量中學習作戰經驗，同時蒐集主要國家情報。如今共軍「常態化」以機、艦擾臺，⁵²且不時越過「海峽中線」企圖壓縮國軍反應時間與空間，並逐漸降低國人警覺，在在凸顯中共犯臺意圖「有增無減」，且不單是對我國「野心勃勃」，其欲爭奪海上、甚至世界霸主之企圖更是「昭然若揭」，這也是美方一直高度警戒之主因。

為軍演正式成員；最近一次為2023年8月於雪梨外海舉行。「四方安全對話」，是美、日、印和澳洲間的非正式戰略對話，最近一次於2023年5月在日本廣島舉行。

註50：〈中共海軍現代化的進展如何？〉，China Power，2019年3月8日，<https://chinapower.csis.org/china-naval-modernization/?lang=zh-hant>，檢索日期：2023年9月15日。

註51：譚昱涵、林政榮，〈中共「認知作戰」對我國之影響-以2022年「圍臺軍演」為例〉，《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7卷，第3期，2023年6月1日，頁133-136。

註52：劉煥彥，〈共軍對臺軍演vs機艦不時繞臺，哪個威脅較大？國防大學專家警告：別小看溫水煮青蛙的危險！〉，《今周刊》(臺北市)，2023年6月27日，<https://www.business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27/post/202306270041/>，檢索日期：2023年9月15日。

面對共軍威脅日增，我國除加速投資於國防科技研發、整合戰略資源規劃國艦國造、國機國造等工程，確保具備足夠的戰略優勢和適應力，以應對共軍全面的威嚇行動。「知敵方能制敵」。國軍不僅應保持警戒、加強戰備整備外，亦應加強與友邦的關係，提高國際社會對中共刻意挑釁行為的關注，⁵³並避免成為美、「中」競爭下的另一個烏克蘭戰場；政府高層同時也要基於維護主權、盡力確保兩岸和平及國家穩定發展，才是「全民之福」。📍

作者簡介：

魏斯諾博士，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中共軍事事務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暨喬治城大學的兼職教授。

包曼女士，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現為SOS國際情報研究與分析中心的數據資料和語言情報分析師，研究範疇包括亞太安全、中國的影響策略和運算宣傳。

譯者簡介：

陳駿穎中校，國防大學管理學院89年班、國防大學管理學院碩士95年班、美國海軍陸戰隊後勤軍官班2012年班。曾任國防大學教行官、國防大學中隊長，現服務於國防大學管理學院。

註53：陳正健譯，〈北約秘書長提俄烏戰爭教訓，警告北京勿犯臺〉，中央通訊社，2023年7月10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307100396.aspx>，檢索日期：2023年10月15日。

老軍艦的故事

恆山軍艦 PF-839



恆山軍艦原為美海軍HERNOD號，編號APD-121，由美國伯利恆造船廠建造，1944年11月3日成軍服役。

民國55年9月，美國依據軍援政策將該艦售予我國，於民國56年1月6日拖抵左營港，1月21日由總司令馮啟聰上將主持升旗典禮，命名為「恆山軍艦」，隸屬海軍第一巡防艦隊。

恆山軍艦成軍後，執行海峽偵巡、外島運補護航及各項演訓。民國59年3月至6月，該艦與玉山艦、安陽艦納編敦睦遠航支隊訪問泰國、菲律賓、韓國、琉球等地，達成宣慰僑胞與敦睦邦誼的任務。民國62年8月1日，因艦體老舊，維修不易，功成除役。(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